



武夷文学读本

廖 斌 ◆ 主 编

程 荣 王冰云 ◆ 副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武夷文学读本

廖 斌 主 编
程 荣 王冰云 副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夷文学读本/廖斌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615-6202-4

I. ①武… II. ①廖… III. ①地方文学史-武夷山市-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95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2476 号

出 版 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薛鹏志

特约编辑 章木良

封面设计 李嘉彬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三明市华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3.75

插页 1

字数 570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序 一

廖 斌*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内容十分丰富,它是运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的组成、风格和特色,探索不同区域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地域特征及差异。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不少著者深入地方和田野,挖掘被忽略的芜杂丰厚的地方文学(化)资源,扩大中国文学研究版图。如山药蛋派、京派、海派、陕军,富有理论自觉和创作实绩的“寻根文学”等都是地域文学的典范。地域文学是璀璨的土地之花,如20世纪90年代始,严家炎等学者编著10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涉及三晋、江浙、巴蜀等地域文学,此后地域文学研究成为热门,先后有一批地方文学史问世,标志性成果有王嘉良《浙江文学史》,陈书良《湖南文学史》,范培松、金学智《插图本苏州文学史》等。地域与文学/文化的关系,古今中外大家,如丹纳、管子到当代袁行霈、梅新林等都曾论及,许多学者更从文化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角度研究地方文学,取得不少成果。本序以空间地域形态视角,略论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对武夷文学的影响。



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不仅自然山川、地貌气候,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各种要素,“如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着作用”。^①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许多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寻根文学”盘点,东密高粱乡的关东文化、葛川江的荆楚文化、客家文化、闽台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都有作家自觉尝试用创作接续和寻找民族、地方文化传统的“根”。梅新林提出“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说,作为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场景还原”说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那些具体可感的特定文学时空场景、发之于那些生动鲜活而蕴义深远的特定文学场景的真情感动。“版图复原”说认为,文学家

* 序者简介:廖斌,男,1972年出生,福建邵武人,武夷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福建农林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南平市高层次人才,2011年入选“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的“户籍”并非凝固不变,而始终处于活动中,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与灵魂、以地理为客体与舞台的文学版图始终变动不居。文学版图的复原即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动态、立体、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②

武夷山地处闽浙赣交界处,是中原文化入闽的必经之路,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山水风光秀丽。自清朝独立设立行政区以来发展相对稳定,也少兵戎之祸,与其他文化区域和周边省份互动频仍,文化创造繁盛,文学发展较快。缘此,武夷文学与武夷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历史、风尚习俗、民众的精气神交融,孕育出有价值的特质。武夷山除柳永和朱熹两大家外,还有一大批先贤推动武夷文学发展。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李侗、李纲、真德秀、杨亿、严羽、袁枢、惠崇、蔡元定、宋慈等名人,代表自宋朝以来武夷文化顶峰。因武夷文化之丰厚,故有“闽邦邹鲁”之称,成为我国东南文化名山。武夷文学就是在丹山碧水、神话传说与闽粤初民开发蛮夷之地的特殊场景中形成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文化传统中催生出的,是中国文学版图的支流与浪漫之花。本文认为,举凡地域文学,首先是“大文学”,一切有一定“文学性”的历代文化典籍、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地方志、笔记信札、文集歌谣、手稿日记、书籍杂志,摩崖石刻、照片实物,文人骚客的行吟游历、酬唱应和等写实、抒怀之作,名人的散记、回忆、历代作家作者扎根武夷的创作等,都可列入“武夷文学”的畛域。据此,“武夷文学”指的一是出生于大武夷地区,籍贯地理为大武夷的作者抒写的作品,如武夷山的柳永,邵武的严羽、李纲等。“大武夷”既是地缘概念,指现今行政区划版图,即泛指武夷山脉南侧,今南平市管辖的十县市区,尽管历史上曾经有过区划变更;又指的是文化概念,即在此区域中,民众共享的同一文化与身份认同,并建构了相对稳定的归属感;二是从活动地理、描写地理看,即非大武夷籍而旅居大武夷的文人书写的关于大武夷题材的文学作品,典型的当属苏轼、陆游、朱熹等人。如朱熹《九曲棹歌》十首、《武夷七咏》等;三是暂居或游历武夷留下的佳作,近的如刘白羽、郭沫若,远的如辛弃疾、陆游等。据杨国学统计,上述三类作品累计达5000余篇。^③如再加上散佚或沉寂民间,如方志、谱牒、楹联、契书中,未得以挖掘、整理的作品及近代、现当代尚未纳入视野或正在创作的文本,数量可能会更庞大。从传播地理看,武夷文学已逐渐借助儒家、佛教和柳永等载体和名家发生着广泛传播。张未民说:

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不论是在写作层面,还是在阅读层面,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意义上讲的,但它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评价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④

由此推论,“大武夷”的“大文学”,既包括所谓“文学性”强、“公认”的作品,也包含一切地方典籍、文献中,反映社会现实,有一定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文本。“大武夷”不是今天的发明,早在西晋就有此一说。如邵武市,古称“南武夷”。邵武史上首称“昭武”,之后有“昭阳”“樵川”“樵阳”等称呼。260年,三国吴永安三年,吴主孙权罢都尉府,置建安都,立昭武镇,后升为昭武县。据明嘉靖《邵武府志》记载:“邵者,高也,昭也;武者,以地在武夷山南,古以南为昭,故曰昭武。”“晋避讳变昭言邵。”(因晋惠帝司马衷为避其祖司马昭之讳,改昭武为邵武。)可见早在1700多年前,邵武即有南武夷之称。^⑤总的来说,武夷文化首先重名教理学。大武夷因朱熹、刘氏三兄弟等人传播理学,又有“道南理窟”之誉,理学发达,崇儒风气深厚。蔡尚思诗云:“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无疑是中国古文化标本。其次,“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的特质凝练,确证武夷文化中有宗教色彩十分浓厚且和谐相处的面向。这就带来武夷文学三教合一的神秘、优美、浪漫而绚丽的特点。再次,由于大武夷是历代人口迁徙的必经之路(路线为皖、苏、赣、闽、粤,进而粤、台、桂、川等)和多种文化交融的过渡带与交集带,因此,武夷文化广纳异质文化质素,既保存农耕文化、爱祖恋乡的性格,又有重商经商、开拓进取的面向。最后,缘于武夷的生态多样、天人和諧、“奇秀甲东南”的山水之美而孕育出“绿色文化”、行吟文学与旅行文学杂糅相济的地域文学元素。梅新林指出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即经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⑥地理“武夷”已然深深内化为武夷文学的最大公约数、主要精神构件和原型意象。



武夷文学多姿多彩、多棱映射。既有忧国忧民的炽热抱负,也有感时自省的深沉凝重;既有理学思辨的文道合一,也有纵情山水的寄寓游历;既有道家文学的超拔通灵,也有神话传说的浪漫诡奇。武夷文学有因宗教、神话而赋予的神性,又有美丽山水馈赠的诗性;还有这片土地和精气神中生长的坚韧与厚实。

1. 以感时忧国为内核

这是武夷文学的主基调。夏志清归纳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精神是“感时忧国”,将之作为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基本叙述基调。^⑦“感时忧国”说是对一定时期文学作品在主题、情感表现以及家国关怀上体现出相同倾向的概括。夏氏此说赢得很多人赞同。在海外,刘绍铭将其发展为“涕泪飘零”说,诗人洛夫有“天涯美学”。感时忧国的写实传统,自晚清以降,一直是我国小说的主流。不管哪一阶段,文学总与时局变化和民族祸福密切相关,感时忧国精神贯穿整个文学发展史。士志于道,朱子理学倡导积极入世,以学识和操守参与中国历史文化进程。正因怀有这样的胸襟抱负,历代知识分子将忧国、忧民、忧己融为一体。忧患意识早已流注知识分子肌体并内化为集体无意识。武夷山有“千载儒释道”的浸润,更是儒家理学的宝地,作为中国文学的一



环,武夷文学不能脱离母体文化而自足,唯此,它才充盈“感时忧国”的厚重感,灌注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不管古代还是近现代,无论是李纲、辛弃疾、陆游,还是严羽、朱熹等人,他们的作品,有的直接抒发对国家人民的热爱,有的通过对大好河山(武夷山)的礼赞而表达对祖国的眷顾。更有诗人怀着对国破家亡、民生疾苦的拳拳之心直接参与抗击外族入侵的斗争。

南宋名相李纲即为代表。李纲生平著述颇丰,卷帙浩繁,后人编为《梁溪全集》180卷。朱熹作序曰:“其言正大明白而纤微曲折,究极事情,去凋饰而变化开合,卓萃其伟。”《全闽诗话》对其人其文给予充分肯定:“梁溪李忠定公纲忠义勋业照耀千古。人但知传其奏疏耳,至其所为诗,气格浑雄,才情宛至。”李纲留给后人“雄深雅健,磊落光明”的诗文,其质地、内涵主要偏向对社会现实、民生疾苦的表现,反映作者忠君爱国、兼善天下的儒家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思想。《伏读三月六日内禅诏》即这方面代表作,全诗共四首,举其一为例:

忆昔廷争驻蹕时,孤忠欲挽六龙飞。莱公漫有亲征策,亚父空求骸骨归。

灵武中兴形势便,江都巡幸士心违。累臣独荷三朝眷,瘴海徒将血涕挥。

诗前自序云:“伏读三月六日内禅诏书,及传将士榜檄,慨王室之艰危,悯生灵之涂炭,悼前策之不从,恨奸回之误国,感愤有作,聊以述怀四首。”此诗具有宋诗“以学问为诗”的特点,多处用典,如以力促亲征,澶渊之盟后被罢相的莱国公寇准以及屡劝项羽杀刘邦以成就帝业,却遭猜忌,最终愤而请辞的亚父范增自比。诗中流露李纲忧心国事,壮志难酬的失望、悲愤之情,写出儒家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强烈的使命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此外,李纲诗序多流露出“感时忧国”的愤懑、孤郁与忧思。如:

自江湖涉岭海,皆骚人放逐之乡,与魑魅荒绝,非人所居之地,郁悒无聊,则复赖诗句摅忧娱悲,以自陶写。每登临山川,啸咏风月,未尝不作诗。而嫠不恤纬之诚,间亦形于篇什,遂成卷轴。

《湖海集·序》

予既以愚触罪,久寓谪所,因效其体,摅思属文,以达区区之志。

《拟骚·并序》

余谪沙阳,寓居兴国佛祠,寝西小轩。春至,梨花盛开,玉雪可怜,修篁嘉木,幽禽百啭。每晨坐读书,午睡初醒,把酒寓目,慨然感怀,因成春词二十篇,以记景物,可以兴,可以怨,庶几乎诗人之旨,览者无诮焉。

《春词二十首》

靖康之事,可为万事悲,暇日效其体集句,聊以写无穷之哀云。

《胡徊十八拍》

总之,李纲发扬前代优秀作家的传统,在国家动荡,生灵涂炭时,以“士之立名节,死国事”自励,显示了以他为代表的武夷文学爱国爱民、感时忧国的情操。

就现当代看,无论是郁达夫、汪曾祺、叶浅予、冯牧的游历抒怀之作,还是朱德、毛泽

东、陈嘉庚的豪迈雄文，或是革命时期，建阳的太阳山、武夷山赤石暴动等，都为武夷文学提供历史与现实的滋养；无论是宏甲的“纪实三部曲”《无极之路》《现在出发》《智慧风景》，还是潘志光的《龙脊洲》，或是刚面世的邱贵平的《五朵厂花》，无不与武夷山水，特别是现实生活有血肉般的联系，这种直面人生、关怀民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自是“感时忧国”传统的一脉相承与光大。

2. 以宗教哲思为灵魂

自古以来，儒释道三教在武夷山和谐相处。宋代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朱熹在武夷山“琴书五十载”，创建影响深远的朱子理学思想体系；佛教中的扣冰古佛，于武夷参悟佛法，名载《五灯会元》；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在止止庵修炼，羽化升仙，成就道教十六洞天福地。宗教是武夷文化特质之一，儒释道奇妙相邻又和谐共存，因此，武夷精舍、天心永乐禅寺、止止庵道观成为武夷文化地标之一，这就注定武夷文学浓厚的宗教情愫。白玉蟾《止止庵记》云：“云寒玉洞，烟锁琼林。紫桧封丹，清泉浣玉。铁笛一声，群仙交集。螺杯三饮，步虚冷冷。青草青，百鸟吟。亦可棋，亦可琴。有酒可对景，无诗自吟心。神仙渺茫在何许？盖武夷千崖万壑之奇，莫止止庵若也。”便畅叙了身处其中修炼的无穷乐趣。

弗莱指出，文学的左邻右舍是历史和哲学，一边向历史要故事，一边向哲学要思想。由于融入宗教等意识形态的人生观、宇宙观，武夷文学呈现耐人寻味的宗教哲理情思，表现了韵外之旨的情趣美、理趣美。武夷山道教文化源远流长，武夷神话传说被收进宋太宗敕令李昉编纂的《太平御览》，武夷君、十三仙等神灵屡受封赠，武夷道教一度十分兴盛。“葱郁龙宫入望深，万年奇胜足登临。寒流九曲环山响，古树千年露殿阴。”这是朱熹对武夷山及其宏伟道教建筑群的真实描绘。从道教来看，“作为金丹派祖师，白玉蟾文化修养高，诗文皆长，艺术水平能代表一代福建士人水平”。^⑧今存白玉蟾诗作，主要见于《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大体看，白玉蟾诗词主要有四类：一是题赠杂咏诗；二是修道歌谣；三是神仙人物及圣贤赞颂诗；四是丹功道意词。

如《快活歌》一小节：

破衲虽破破复补，身中自有长生宝。拄杖奚用岩头藤，草鞋不作田中藁。或狂走，或兀坐，或端坐，或仰卧。时人但道我风（疯）癫，我本不癫谁识我？热时只饮华池雪，寒时独向丹中火。饥时爱吃黑龙肝，渴时贪饮青龙脑。绛宫新发牡丹花，灵台初生蕙苕草。却笑颜回不为夭，又道彭铿未是老。一盏中黄酒更甜，千篇《内景》诗尤好。没弦琴儿不用弹，无生曲子无人和。朝朝暮暮打憨痴，且无一点闲烦恼。

尽管诗人衣衫褴褛，旁人嘲笑，但仍苦中作乐。他之所以达到这种境地，首先是有求道信念，其次在于练就龙虎大丹。诗中所谓“华池雪”指炼内丹时口中出现的津液。而“丹中火”指丹田热感。至于“黑龙肝”“青龙脑”均为譬喻，皆指内丹修炼所获得的特异效果。道教修炼金丹一方面源于内心乐趣，另一方面盼返老还童，鹤发童颜，这是道家孜孜以求之事。白玉蟾也乐在其中。

《水调歌头·自述》三：

苦苦谁知苦，难难也是难。寻思访道，不知行进几重山，饥了又添寒，满眼无人问，何处扣玄关？好因缘，传口诀，炼金丹。街头巷尾，无言暗地自生欢。虽是蓬头垢面，今已九旬来地，尚且是童颜。未下飞升诏，且受这清闲。

这首诗写修炼妙用。他虽吃了很多苦，走了许多弯路，但终获金丹秘诀。这种修炼的快乐，外人无从知晓，所以“暗地自生欢”；他不修边幅，外表异于常人，可面存童子色；他希望天界上真下诏，以便乘鹤归去；未接到天诏前，他清闲自在。全诗语言浅显明白，包含深远“道意”。

有“道意”就有“禅意”，向以“佛宗道源”著称的武夷山，其文学多佛光普照。除随处可见的楹联石刻，如天心永乐禅寺“古刹历尘劫，今犹剩半亩方塘、一渠活水；名山留净土，实有赖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松声竹声钟磬声声自应；山色水色烟霞色色昏昏空”，瑞岩禅寺“断桥泉冽冰池净；深树云飞法界空”，尚有不少禅诗文或叙修炼之苦乐，或解禅意之机锋，颇富哲理。略举数例：

瑞岩寺

（宋）朱 熹

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欲崔巍。
谷泉喷薄秋欲响，山翠空蒙画不开。
一壑祈今藏胜迹，三生畴昔记会来。
解衣正作留连计，不许山灵便却回。

题中峰寺

（宋）柳 永

攀萝蹑石路崔嵬，千万峰中梵室开。
僧向半空为世界，眼看平地起风雷。
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青溪入槛来。
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道更迟回。

到后来，儒释道互渗，道教与佛教互动，增添佛教奇迹，而儒林入佛，则更显佛学深邃，一代名儒胡安国、胡寅、刘子翥等均深研禅理，卓然有成，朱熹也曾参禅事佛，集儒、释、道之大成，蔚为大观。这些名人诗文反之增添武夷文学的隽永与韵味。如家喻户晓的朱熹诗《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以形象的方式，探讨格物与致知、源与流的辩证关系，哲思无穷；朱熹手书“逝者如斯”摩崖石刻更以登幽州台歌的方式，感喟宇宙永恒与生命短暂，叹惋个人在苍茫穹宇，沧海一粟般渺小无力。这种突兀与孤寂，矗立出万世师表在亘古时间之流的苍凉背影。

武夷文学的宗教情缘，就在于内面的理趣和情趣，在于豁然开朗的妙悟与回味悠长

的启迪。正如宋诗中优美富有理趣的哲理诗,“关在情景交融,理在境中;美在‘触景生理’,景理浑成;美在造境说理,而又含蓄自然;美在议论说理,而又形象生动,韵味深长。理趣情趣成为武夷文学的重要一极和新审美功能,进一步强化了武夷文学的特质”。^⑨总之,武夷文学因为作家的感悟、参悟、顿悟而突显哲思风华。特别在风景绝佳处、宗教静谧处,更易触发作者对社会变迁、人生沉浮、历史兴衰、天下兴亡以及宇宙时空、道学义理等的形而上思考。这些山水诗、道教诗、禅诗、楹联等,虽多从宗教角度勘悟人生,透露出大智慧和大欢喜。换一个视角看,亦是脱尘的哲理思辨与教诲。

3. 以行吟游历为风骨

武夷山自古就是风景秀丽、人文荟萃之地,注定是人生的驿站——既是结庐修行、讲学、旅游的好去处,又是交友览胜,凭今吊古的地方;既为东南形胜,秀甲一方,更是文人骚客人生旅途中必经的客栈,是缘定此生的驻守。唐开元年间,武夷山被封为“天山名山”,一些道教徒和隐逸之士对武夷山产生浓厚兴趣,行吟游历既多,描绘武夷风光、自然山水和抒发隐逸意趣的作品自然多。唐肇始,吕洞宾、李商隐等人的诗文已有武夷风光和神话传说的描写,此后,历代名人、文学家或游学或暂居,留下大量优秀文学作品,朱熹、陆游、辛弃疾、苏轼、欧阳修、范仲淹、黄庭坚、晏殊、刘克庄等是其中杰出代表,他们纵情山水抒发块垒,借景抒情寄寓人生,铸就武夷文学的风骨。其中又以朱熹《九曲棹歌》十首传播最为广泛,是对武夷山九曲溪的全景扫描,也是描绘九曲溪的一幅长卷佳作。徐渭、戚继光等文武精英也在此留下鸿文精品。徐渭在《游九曲·题冲佑观壁》中写道:“携玉女,凌妆镜,故人今夜来却来,何须独卧梧桐影?”抗倭名将戚继光以“赳赳鄙夫”署名题壁的七绝更令人勃发豪兴:“一剑横空星斗寒,甫随平虏复征蛮。他年觅取封侯印,愿向君王换此山。”此外,本土作家作品亦精彩纷呈,自北宋浦城杨亿为世人留下《武夷新集》《西昆酬唱集》,后有章粲《寄亭诗遗》《成都古今诗集》,黄亢《东溪集》,吴育《西酬录》,真德秀《星沙集志》《西山文集》,叶绍翁《靖逸小集》。刘子翬《屏山集》,廖刚《高峰集》《世彩集》,廖德明《槎溪集》,余良弼《龙山文集》等,崇安人翁彦约《诗文集》10卷,咏吟武夷山诗较多,这些作家群星璀璨,作品蔚为大观,其中不少抒写武夷之作,至于柳永“忍把浮名,换做浅斟低唱”,他的人生就是一部才子行吟游历的历史。今人武夷籍作家张建光、陈祥龙、李龙年、王长青等诗文对武夷山或深情礼赞,或顶礼膜拜,承继武夷文学的流风余韵。

总之,武夷文学自古而今,行吟游历题材占相当比重,这也从量和质、形态与规格上暗合“大武夷”作为集理学名邦、旅游胜地、宗教名山于一体的“身份”,可以说,自司马迁《史记》记载汉武帝派官员以干鱼祭祀武夷君后,千年文学历程中,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行吟文学是武夷文学源远流长的文脉,凝固了众多名人名家的吟哦游历,见证了僧侣、道士、宦宦、文人学者、雅士骚客与武夷的不悔之约,因此,有行吟文学的支撑,武夷文学才相对完整构建出基本框架、图谱与特质。当代文学家、大诗人郭沫若1962年畅游武夷,曾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游武夷泛舟九曲》即其一:“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



姿。凌波轻筏觞飞羽，不会题诗也会题。”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将此诗印在“武夷”牌香烟之上发售，后据说因知识产权疑义而停产，如今游客再也见不到郭沫若武夷诗的商品转化，此事既为公案，也是一段与武夷文学有关的美好记忆。

4. 以神话传说为滥觞

名山大川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蕴藏着动人的神话传说、奇闻逸事，其中大部分成为通俗文学的题材，有的则经过文人整理加工而跻身雅文学。这些作品虽有的并非直接依附于名山，也不呈现为具体的体量或形象，但却间接渲染名山风景，强化人、景间的感应关系，深化风景的意境。武夷文学神奇瑰丽、绚烂诡谲的特质就得益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涵养。周作人指出：“中国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反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⑩在此，他力图在“新”与“旧”之间找寻历史关联，为“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寻求历史根据，他实际上进行的是一次溯流穷源的寻根之旅。

武夷文学与武夷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一脉相承，既是流与源的关系，又从中汲取大量创作素材和文学养分、创作灵感。最早，初民的神话传说构成了武夷口传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经历代演绎、加工、创作，又增加了许多故事，今人彭盛友、胡黛棣编著有《武夷山美丽传说》。其中，许多妇孺皆知故事传播甚广：玉女、狐仙、铁板鬼、镜台、桃源洞、和尚背尼姑……此外大武夷地区还多有“梦笔生花”、黄峭发家、程门立雪、双剑化龙、湛卢冶剑等典故传说；近年文史工作者又探幽发微，从地方典籍和传说中钩沉出顺昌的宝山大圣及流布海峡两岸的大圣文化、在“武林江湖”震古烁今的张三丰等人事物，武夷神话进一步丰富内涵，武夷文学增加了源流。如今，大圣文化节已成为台海两岸重要民间节庆活动。要之，武夷神话传说极其丰富瑰奇，有的载之史册，有的口口相传，有的诗文传诵，有的演绎变化，加之山中“仙踪”处处，予以人们无尽的想象和遐思，特别是武夷山道观、庙宇甚多，历代有许多著名“羽人”（即道士）如李良佐、白玉蟾等在此间修炼；武夷卓绝的丹霞地貌磊落怪奇，或如仙人楼台、亭榭、城壁、仓廩、华盖……引人悠然神往。当扁舟荡漾在水天一碧、峰回石转的九曲溪上，对酒当歌，云开雾阖，与仙境又有何异？因此，武夷“仙凡界”一景，实是道出武夷风光如诗如画，亦仙亦凡，如虚如幻的迷魅。武夷九曲溪畔有桃源洞，仿陶渊明《桃花源记》意境遍植桃树于其间得名。跨过漳上石桥，洞门额“桃源洞”三字映入眼帘，两侧楹联为：“喜无樵子复观弈，怕有渔郎来问津。”这里蕴含的神话传说即“烂柯山”与“桃花源”，是令世人景仰和神往之处。现在，武夷学人正将武夷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借助动漫载体进行系列再创作，以文化创意的新途径、新方法回馈社会，获得很大回响与肯定，用新媒介扩大武夷文学的传播地理半径。

总之，武夷风华造就了武夷君、大王、玉女、武夷太姥、大红袍、麻姑奉宴、彭武、彭夷、丽娘与朱夫子等美丽神话，这些动人传说反之增添了武夷的神韵与奇诡。武夷神话传说作为武夷文学的一维，走的是浪漫主义的路径，丰厚了自身的源头；自此迤逦而下，武夷文学断不了民间文学的滋养，更练就“神性”、“诗性”、“世俗性”内丹，既表现为神秘浪漫、诗意盎然，又有仙界、凡间紧密结合的人间烟火味，民间故事朴实、戏谑的特点，较

之三秦大地、齐鲁文学多了一份空灵、飘逸与瑰丽。

5. 以绿色文化为基因

“绿色”是武夷山的亮色、底色和特色；“绿色”是武夷文学的遗传基因和特殊谱系。这里的“绿色文化”是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是亲近自然，天人合一；是环境友好、茶香宜人；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武夷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以“丹山碧水”闻名于世。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图腾”。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山岳作为风景对象来经营的国家，也是最早把山岳风景作为观光对象来审视的国家。早在先秦，人们已发现山岳的审美属性，并赋予山岳以人文性格，“夫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四方益取与焉。出云导风从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⑩因此，武夷山除了浑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自然风光有了新的功能和意趣：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山岳环境内，那充满美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诸如岩石、土壤、水体、植物、动物、云雾、雨雪以及阴晴、明晦、季相等，它们或独立或综合构成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给予人们最大限度的美的享受，人们在其中乐享天人合一、生态文明，在水穷处坐看云起，在遐思中品味人生。它们是武夷山自然美的精华，“绿色”是武夷山的精魂。武夷“丹山”中，丹霞地貌的地质构造、地貌景观和岩性特征有了审美新内涵；蕴藏其中的动植物资源、自然生态群落、稀有动植物品种，以及特殊形态的水体、罕见的局部小气候、特异的天象等，则是“碧水”的审美意趣，共同为武夷山审美和文化旅游提供取之不竭的宝藏，为武夷文学奉献数不胜数的素材。武夷文学的“绿色”基因图谱展示了特有魅力。

未到名山梦已新，千峰拔地玉嶙峋。慢亭一夜风吹雨，似与游人洗俗尘。

陆游《初入武夷》

玉女峰前一棹歌，烟鬟雾髻动清波。游人去后枫林夜，月满空山可奈何。

辛弃疾《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

一溪九曲贯群峰，荡漾轻舸浅碧中。杳如误入武陵去，落花流水山重重。

李纲《游仙溪》

濯濯清溪九曲流，一天风露万山秋。啸歌不似人间世，月榭云窗特地幽。

翁彦约《题武夷》

百粤尧时路未通，曲溪春水没长松。老仙台上垂明月，不钓凡鱼只钓龙。

翁彦约《钓鱼台》

特别要指出的是，茶文学也是武夷文学的“绿色”特质。清国子监正銜蒋蘅作《晚甘侯传》，用拟人手法写《晚甘侯传》：“晚甘侯，甘氏如荠，字森伯，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讲的是宋代的武夷茶。苏轼《叶嘉传》亦以拟人手法，把武夷茶名为“叶嘉”，意为叶子嘉美。叶嘉的曾祖茂先好游名山，游到武夷山“悦之，遂家焉”。当时有位任汉武帝近臣的建安人，把叶嘉举荐给汉武帝，得帝欣赏，待以名流礼遇，还命学者欧阳高、大农令郑当时、谋士陈平陪同之。其间虽有大臣贬嘉，但帝力排众议，赞嘉如“清白之士”

(时茶汤沫贵白)。凡遇到大小宴会,都要请嘉出场。并封之为“钜合侯”,意即不随波逐流者。受到重用。最后,苏轼赞曰:今居于闽中者,皆嘉之后代也。嘉以布衣遇天子晋爵封官,他竭力许国,不为身计,体现了嘉为民谋利的高风亮节。其实苏轼这是赞扬武夷茶及建茶。最著名的当属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其中“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将武夷茶的来源、地位一锤定音,至今回响,堪称武夷茶诗顶峰。今人赵朴初有《闽游杂咏》,吟咏武夷茶之于人生与养身的妙处:

云窝访茶洞,洞在仙人去。今来御茶园,树亡存茶艺。炭炉瓦罐烹清泉,茶壶中坐杯环旋。茶注杯杯周复始,三遍注满供群贤。饮茶之道亦宜会,闻香玩色后尝味。一杯两杯七八杯,百杯痛饮莫辞醉。我知醉酒不知茶,茶醉何如酒醉耶。只道茶能醒心目,哪知朱碧乱空花。饱看奇峰饱看水,饱领友情无穷已。祝我茶寿饱饮茶,半醒半醉回家里。

纵览古今中外,抒写武夷茶的诗文不计其数。如果说时光是一条河流,那么武夷茶诗文就是武夷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激越和欢唱着武夷茶永恒的生命意蕴,一路奔涌而去。这些诗文,或感兴赞叹,或吟咏托喻,或抒怀言志,或品茗论道,从不同视界和感悟极尽抒写,既是一部武夷茶文化的华美长卷,又映现武夷文学厚重而悠远的岁月时空,展示武夷文学“绿色文化”的生命流程。

总结武夷文学及其特质,是一次返乡之旅。武夷文学不会终结,它站在新世纪的起点,承载千年的地域文化精髓再出发。

(注:本文所引诗文皆自武夷民间刊印诗文集、摩崖石刻、楹联、题壁等,不一一注明。)

参考文献

- ①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1.
- ②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N].文艺报,2006-06-01.
- ③杨国学.武夷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13.
- ④高玉.放宽评价尺度,扩大研究范围[J].文艺争鸣,2008(3):1.
- ⑤邵武市人民政府网.<http://222.78.250.90:81/showZjsw.aspx?ctlgid=917361>.
- ⑥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N].文艺报,2006-06-01.
- 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59.
- ⑧詹石窗.诗成造化寂无声:武夷散人白玉蟾诗歌与艮背修行观略论[J].宗教学研究,1997(3):24—32.
- ⑨刘坎龙.论宋诗的理趣美[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8(5):20—22.
- ⑩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与流小引[M].北平:人文书店,1932:6.
- ⑪贝才刀巴.溯古追风世界历史论坛.<http://bbs.xhistory.net/simple/?t4692.html>.

序 二

张品端*

武夷山所在的闽北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丰厚的历史积淀,孕育和产生了辉煌灿烂、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化。武夷文化是以古闽渔猎农耕文化为源头,以朱子理学为核心,融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于一体的区域性文化。它既是区域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夷文化某些方面曾在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明发展史上处于领先水平,为人类进步做出过贡献,因而研究武夷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现从武夷文化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分期及其内容、特点三个方面做一些介绍。

一、武夷文化的形成

武夷文化是产生于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地区(即古代的建宁、延平、邵武三府之地),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下面分四点来说明:

1. 地理环境对武夷文化形成的影响

闽北的西北面是武夷山脉,绵延 500 多公里,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它把整个福建与浙江、江西以至北方中原各地天然地阻隔开来。所以,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说,闽北“全闽之藩屏”。其境内有发源于武夷山脉的富屯溪和建溪自北向南而流。河谷与山间小盆地错综其间,是一个以丘陵为主的内陆山区。因而,该地区在气候、地貌、水系上都自成单元,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自然环境的这一突出特点,是造成武夷文化与相邻区域文化有所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也是造成武夷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形成之不同方式。这一自然环境特点,还是后来许多中原古文化及先进地区的区域文化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闽北都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原因所在。闽北山区地处中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白天冬短夏长,非常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是史前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直接提供生活资源生存的理想栖息之地。

在海路开通之前,武夷古闽人为了与中原各地取得联系,利用东北与浙江相邻,西北与江西相邻之便,打通了闽浙、闽赣三条古通道。这三条古道就是古代福建三条出省

* 序者简介:张品端,男,1955 年出生,江西黎川人,研究员。武夷学院科研处副处长,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秘书长,武夷山朱子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朱子学。

大道：出浦城仙霞岭入浙江，出崇安分水关入赣北，出光泽杉关入江西中部。大凡进入福建的北方移民，首先要通过这三条大道，翻越武夷山脉，进入闽北，然后才能到达福建各地。闽人与外界接触亦如此。这一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使闽北成为福建的“文化走廊”。它不仅以沟通福建与中原文化的走廊而著名，而且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历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2. 中原文化的传入促进了武夷文化的形成

中原文化的传入，加快了闽地的开发，促进了武夷文化的形成。从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北方汉民及其文化进入闽北，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①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中原战乱兴起，人民四处逃亡，闽地为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不少逃亡的中原汉民，便开始大批量入闽。当时建安郡（福建省唯一的一个郡）辖下有建安、南平、将乐、建平（今建阳）、东平（今松溪）、邵武、吴兴（今浦城）、绥安（今建宁、泰宁县地）、侯官、东安（今同安、南安县地）等十县。这十县中，除了东安与侯官之外，其余八县都在闽北，可见当时闽北地区是北方人民入闽时的最初居留地。闽北山水秀丽，田园丰美，也自然吸引了许多北方移民定居。如《建宁府志》所说：“建居闽峤上游，土风清嘉，山水娱人，故君子乐居之，其游宦往来者，往往占籍而家焉。”^②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证实了东汉末、孙吴时期北方人已逐渐在闽江上中游地域定居下来。1995年霞浦县城关发现吴永安六年（263年）墓砖，霞浦县故县村发现吴“天纪三年”（279年）墓砖。这是福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纪年砖。1958年和1976年先后于闽侯荆溪庙后山与福州金鸡山发现两座东汉时期的土坑墓，出土有陶罐、陶壶、陶灶、陶甗、陶耳杯、陶滤器、铁釜、铁剑、铜镜、五铢、货泉等。这些文物足证当时北方汉人的入闽趋向以及汉文化在福建地区的传播。两晋时期，北方汉人又一次大批入闽，继续留居于闽北“两河”广阔的丘陵地带。嘉靖《建阳县志·风俗志》载：“因中国北方战乱，晋永嘉三年（309年），危京从光州的固始县率乡民避乱到建阳任刺史，其乡人均落籍建安。”民国《建瓯县志》亦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我们还可从考古发掘，看到北方汉人迁入闽北地区的线索。1973年在闽北松溪县渭田公社（现为渭田镇）发现一座西晋古墓，出土了很多文物，并有“永兴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建造”的纪年文字。^③1983年，在今浦城县莲塘乡吕厝坞村发现西晋墓群，墓砖有“元康六年（296年）秋冬告作宜子孙王家”“元康六年（296年）王家”等铭文。^④这说明西晋元康六年（296年）以前就有汉人王姓的家族迁居埔城。

随着北方汉人一批又一批地入闽，从根本上改变了闽地居民的结构，闽北成为闽越人与北方汉人交往频繁的地区，而交往频繁必然带来诸多文化交融和积淀。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⑤故《建安志》云：“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指闽北），故建安备五方之俗。”同时，一些汉人与土著居民通婚，或土著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自动转化为汉族，闽越族的一些习俗风尚及其人文特点也沉淀下来，成为武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闽北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武夷文化的形成

唐末五代,闽北经济的快速发展亦与北方移民南下有关。数以万计的中原人士移居闽北,使闽北户口增至 19.5 万户,约占福建路总人口的 41.6%。^⑥此时,闽北“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所致,雨露所举,无不少获”。^⑦除了粮食种植外,闽北经济主要表现于矿冶业与制茶业。闽北的矿业,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的记载,建州是一个金属矿较多的区域:建安有银,有铜;邵武有铜,有铁。其中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7%。建阳蔡池、邵武黄齐两地已能用胆水浸铜法炼出铜,浦城因奖(今属忠信乡)矿场能将铜、银混合矿石中的两种金属分离提炼出来。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制茶业方面,建州茶叶在唐末成为贡品,北苑周围 30 里,曾设官焙 32 所,又有小焙 10 余所。《东溪试茶录》云:“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⑧六县即指建安郡的六县:建安、浦城、松溪、邵武、建阳、将乐。需调动六县民夫,北苑规模由此可知。此外,建州铸钱业的发达,也说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闽北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武夷文化的形成。

宋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新的转折时期,也是武夷文化形成和演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中原文化广为传播的基础上,以及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闽北社会经济文化跻身全国发达地区行列,在某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仅以闽北教育为例,北宋政和四年(1114 年),建州州学人数达到 1328 名,在全国的州学人数中名列第一。^⑨浦城县县学学生超过 1000 人。^⑩可见,北宋闽北州县学规模之大。宋室南渡后,“中原人物,荟萃东南”,历史性地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南北文化的格局。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兴起,使闽北成为当时全国学术中心,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一带形成了中国文化南移的新的文化重心——朱子学。正如当代我国著名的思想史专家蔡尚思教授所说:“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蔡教授的名言,点明了武夷山文化的精髓所在。

4. 海洋文化对武夷文化形成的影响

海洋文化对武夷文化的形成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福建依山傍海,闽北位于闽江上游,顺闽江而下即可到达福州、兴化和泉州等沿海地带。唐元和二年(807 年)福建观察使陆庶沿闽江干流,开通福州至延平(今南平市)陆路,全长约 200 公里,称“延福大道”。当时福建官路就是从这条延福大道入延平,再分三路出省上京。闽北至福州有水路和陆路之便,从北方移居来的汉民,往往又从闽北向闽江下游及沿海等生产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转迁。这就使得闽北山区的汉民迁徙呈流动性比较大,迁入迁出均比较频繁的特点。宋代泉州刺桐港、明代漳州月港都是当时世界贸易大港之一,海洋文化底蕴深厚。闽北与沿海的福州、兴化、泉州和漳州等交往频繁,作为“福建的文化走廊”,它向外传输了武夷文化,又吸纳了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拥有多元的文化遗存。

总之,从文化形成的角度观照,武夷文化的形成与闽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海洋文化的吸纳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关系密切。它既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又兼具极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二、武夷文化的历史分期及其内容

武夷文化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它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并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和外来文化撞击、整合和交融,有着自己的丰富文化内涵,诸如图腾文化、闽越文化、理学文化、民俗文化、印刷文化、陶瓷文化、旅游文化等。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武夷文化也一样,不同时期有着具体的文化特质。下面就武夷文化的内容从8个历史分期做些介绍:

1. 上古时期

上古时期,武夷原始居民(史学界称之为古闽族)就创造了闽北历史上的原始武夷文化。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考古发掘的牛鼻山文化。它是以闽北浦城县管厝村牛鼻山遗址为代表,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13座,随葬器30多件,以及地层中发现的陶石器等。^①随后,发现武夷山市的梅溪岗遗址下层、邵武市斗米山遗址下层等也属于牛鼻山文化遗存。^②其主要特点是:遗址都位于河旁低矮山冈顶部;日常生活用的陶瓷以泥质磨光陶为主,夹砂陶较少,流行三足器,制作方法为手制和轮制并存;房屋是搭筑在稍经河卵石铺垫的生土台上,“干栏式”木架结构的建筑;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圪,随葬品多寡不一,个别墓葬随葬玉璜、玉锥等贵重物品,表明社会财富的占有已有一定程度分化。从墓葬出土的器物提供的科学信息表明,闽北牛鼻山文化距今4000年前后;从出土的石网坠、石箭镞、石戈、石矛、石镰、石刀、石斧和石镞等看出,牛鼻山文化的主人主要从事渔猎农耕活动。并据考古发掘研究,生活在闽北建溪和富屯流域的武夷先民,在原始社会晚期,就与江西东北部的原始居民有比较密切的文化来往,与闽江下游沿海一带的昙石山文化居民也有交往,从而形成闽北史前文化的多元性。

2. 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武夷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武夷山悬棺葬俗文化。武夷山的悬棺葬分布在武夷山九曲溪两岸的绝壁上,置于高耸岩峰的洞穴内,一般距溪面70米。距今1500多年的南朝曾有史籍记载说:“武夷半岩,有悬棺数千。”清《武夷山志》统计尚存16处。1998年9月,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队从白岩洞穴内取出一具完整的悬棺。经过碳十四方法科学测定,船棺年代距今3750—3295年,是目前考古发掘中年代最早的。悬棺用整根楠木剝制而成,随葬品中有纺织品残片,如大麻、萱麻、丝、棉四种原料。其中棉织品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棉布实物质料。可见,当时武夷先民已有较高的纺织水平。悬棺为船形,反映了当时古闽族生活在溪河山谷之间,形成的山行水处的生活习俗和独特的审美理念。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武夷山葫芦山发掘出6米多长的我国夏商时期最长的龙窑,出土陶器上的印席纹、云雷纹、方格纹等几何图形,以及独有的“三足鼎”均不同于其他地区,独具特色。

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击败,大批越人迁居闽地,与闽族融合而成闽越族。他们带来了吴越文化,并与闽族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闽越文化。